

Academic Monographs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 (第二辑)

英汉翻译理论与 教学研究

杨彩霞 / 著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eachi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第二辑）

英汉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

杨彩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数据

英汉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杨彩霞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第二辑)
ISBN 978-7-300-10861-2

- I. 英…
- II. 杨…
- III. 英语-翻译-教学研究
-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8591 号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第二辑)
英汉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
杨彩霞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献拓方数字印刷中心		
规 格	140 mm×202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0 插页 1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5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在当今日益信息化的社会，世界各国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愈发频繁，翻译作为操不同语言的人们相互交流的桥梁，发挥的工具作用将会越来越大。翻译理论的学科建设一直是翻译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有关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与进展，但相对于当前社会对于翻译的诸多要求则相去甚远。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我国译界也有不少优秀译作问世，为人们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财富和精神食粮，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亦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毋庸讳言，当今翻译作品之中仍不乏粗制滥造之作，翻译水平亟待普遍提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翻译理论的建设势在必行。

目前大学翻译教学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教材建设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环节。翻译教材建设的诸多不足严重影响了翻译教学的全面和深入开展。就笔者所知，目前理论性强、内容新颖的系统翻译教材极为罕见。大学翻译课堂上使用的教材要么是多年前的翻译理论教程，要么是教师自编的讲义。前者虽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但毕竟年代久远，撇开理论更新发展不讲，单是许多例句就很陈旧，已远远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今学生的需求。而在某些翻译理论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后者必定会加剧翻译观的差异，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方向性问题，造成似乎一个译者一种翻译观的混乱局面，往往让初学者感到无所适从，有时甚至伴有

误导之嫌。即便是有一定翻译积累的译者有时也会茫然然，对优劣译文的欣赏和评判感到无从下手。

翻译教材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具有较高理论修养和范式、内容新颖翔实的系统翻译理论的缺席。如何在较高理论素养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的翻译原则，高效地指导当前的翻译实践活动，已经提到翻译理论研究者的日程上来。与其他学科相比，翻译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可以利用信息时代各领域的新型知识与框架来加强和拓宽翻译学的建设，比如，语言学、文学、美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使得从不同角度、各个层面拓展翻译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成为可能。笔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构思、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抛砖引玉，希冀各位同行对此问题有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本书旨在系统介绍翻译理论知识的前提下，结合英汉翻译实例，针对翻译理论建设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全书约有二十八万字，采用理论—问题—实例的研究范式，分为上（理论）、中（问题）、下（实例）三编。上编主要涉及翻译的基本理论范畴及目前发展状况，并对中外翻译的历史和发展态势作一必要的回顾与梳理，力图对翻译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理论问题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的分析和整合。中编针对翻译中常见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结合翻译理论和技巧，综合出一些基本方法，以期更好地为翻译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实际操作提供技术上的指导。本书讨论的文章体裁范围限于两个方面：文学翻译和实用类翻译，并侧重于前者。这样分类的目的主要是基于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考虑。首先，文学作品占据了翻译的一大部分空间，其语言的精髓、内容的驳杂、风格的迥异是培养译者素质、提高翻译水平不可或缺的一个园地。其次，随着信息社会的渗透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会接触到各色各样耳目一新的知识和思想，非文学类作品——实用型内容——的翻译逐渐成为热门话题，譬如广告、科技产品、旅游翻译等，不一而足。此类翻译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往往令读者茫然不解，译者尴尬万分。这类具体的实际问题，应是翻译学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以便真正发挥翻译在现实生活中的工具

作用。本书的下编主要是在上述翻译理论和技巧框架之内，在语篇分析的基础之上，探讨在具体上下文语境里如何处理遇到的相应问题。这一部分主要是实例的分析和论述，旨在对翻译实践有直接的引导作用。

本书所主张的翻译理论和原则是在吸纳借鉴前人合理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笔者近年来的翻译实践以及讲授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经验 and 体会，总结出来的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在本人的翻译实践和指导学生学习翻译训练的过程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因此，笔者希冀把这些内容归纳整理出来，拟对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有一定的启发和引导，并与同行商榷。

目 录

上编 翻译理论概述

第一章 中外翻译事业史的梳理	3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发展史概述	4
第二节 西方翻译发展史概述	8
第二章 翻译概念的演变和诠释	16
第三章 翻译的标准、方法和技巧	20
第一节 翻译标准	20
第二节 翻译方法	26
第三节 基本技巧	28
第四章 翻译的过程	53
第一节 翻译的步骤	53
第二节 对译者的要求	54
第五章 关于翻译的几对有争议的问题	58
第一节 直译和意译	58
第二节 可译与不可译	60
第三节 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64
第四节 翻译中的歧义问题	66
第五节 “归化”与“洋化”	67
第六章 翻译的伦理维度	70

第七章 翻译批评研究	73
第一节 译文赏析与评判	73
第二节 翻译批评综述	74

中编 翻译专题研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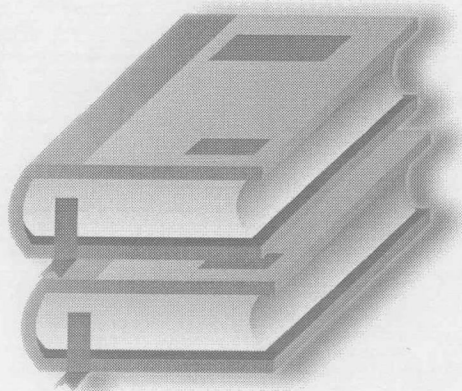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如何在上下文语境中选择合适的词语	79
第二章 文化差异在译文中的具体体现	114
第三章 英汉翻译中“形合”与“意合”的处理	127
第四章 非生命事物作主语的译法	135
第五章 定语从句的处理手法	141
第六章 英语特殊比较句的汉译	151
第七章 汉语“比”字结构的英译	163
第八章 英汉翻译中的文化象征意义	173
第九章 隐性否定句式的译法	204
第十章 应用文类文体翻译	206
第一节 新闻标题的翻译	206
第二节 广告体的翻译	211
第三节 品牌名称的翻译	218
第十一章 长句的翻译	220
第十二章 连词“and”和“if”的译法	233
第十三章 译名问题	246

下编 英汉篇章翻译

第一章 英译汉语篇分析	259
第二章 英译汉篇章实例	274
参考书目	310
后记	311

• • • • 上 编 • • • •

翻译理论概述



第一章 中外翻译事业史的梳理

在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中，翻译充当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角色。语言与思维是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最重大标志。《圣经》记载，上帝看到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同心协力要修建一座通天塔，恐怕人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威胁到他的统治，于是就打乱了天下人的语言，使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人们拥有不同语言。不能自由交流，修建通天塔的理想自然付之东流，上帝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统辖人类了。

然而，天算不如人算。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地人们的交流愈发频繁，翻译的存在及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工具作用，使得语言似乎不再是人类前进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和鸿沟。不过，从理论上讲，翻译一直是作为其他学科的附属分支而存在，并没有享受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应有的地位。近年来，有理论家提出了“翻译学”（transology）的概念，是翻译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翻译学体系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重要翻译概念仍有待澄清和界定，这是因为对于翻译的一些基本理论，译者和理论家也是各持己见，众说纷纭。

因此，本章拟从翻译史入手，在此基础上澄清这些基本概念，为下文的理论分析打下基础。本章的两节分别从中国翻译史和外国翻译史的视角出发，简略概述翻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梳理在此过程中翻译相关概念的演变发展，力争提供一个全面清晰

的思路，为构建翻译研究的框架进行理论上的铺垫。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发展史概述

大体而言，中国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期，人们口耳相传，交流感情、表达思想和传递文化信息，即所谓的口译。文字出现以后，才开始有书面翻译。自古就有“舌人”、“通事”、“象寄”等称号或官职，相当于现在的译员、译者、翻译官或翻译工作者。早在周代，就出现了口译和笔译，因为当时许多异族和汉族的言语不通，不借助于翻译根本无法沟通。有史记载的翻译活动与宗教活动直接有关，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佛经翻译。

我国早期典籍《周礼·秋官司寇》篇里就有“象胥”这一名目。唐朝贾公彦所作的《义疏》里提道：“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就是说，翻译即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不改其义，以达到相互理解之目的。秦汉时期，翻译事业有所发展，已出现“译长”和“译使”的官职。在严格意义上讲，东汉初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佛教早在上古时期便在亚洲诸国传播，东汉时传入我国。此后的近千年内，共翻译佛经一千五百多部，出现了众多著名的翻译家，如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的支谦、东晋时的释道安、六朝时代隋代的彦综和唐朝的玄奘。我国翻译佛经，确凿可考应自东汉桓帝时安世高所译的《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始，他本人译了三十多卷。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隋朝到唐朝期间，翻译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唐朝达到最巅峰，北宋渐衰，元朝以后则渐入尾声。三国时支谦的《法句经序》是中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据钱钟书先生考证，“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①这一时期出现的译家，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外，著名的还有竺法护，

^①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他译了175卷经，对佛经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这些译经活动皆属个人行为，译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组织和筛选。直到东晋的释道安，译事才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当时主张严格的直译，并多用音译的方法。道安还总结出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此外，还出现了删削原文的现象，因而文简而不能尽表原义。此间，从天竺请来鸠摩罗什（344年—413年）对先前所译经本进行整理。鸠摩罗什摒弃原先的直译法，主张意译，摒除了音译的缺陷。鸠摩罗什不仅是主张全面意译的第一人，还是第一位主张为译者署名的人。他大约译了三百多卷，其译作被人称为具有“天然西域之风味”，为以后的文学翻译打下了基础。南北朝时期，印度著名佛教学者真谛来到中国，译了49卷经典，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隋朝的历史较短，因此译家和译著都很少，其中最著名的是释彦宗，他生活在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翻译思想。

唐朝的玄奘（602年—664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译家，他在位于现在西安的大慈恩寺中主持译经事业，设置译场，亲任译主，借助于50位学德兼备的高僧的力量，制定了翻译例律，人员有着严密的分工。19年间组织、翻译了75部、1335卷佛教经文，并把老子的作品译成梵语，是第一位把中文著作译成外文的人。玄奘对翻译理论也有贡献，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通顺并重，在当今的译界仍不失指导意义。玄奘的译文通常被誉为“意译直译、圆满调和”。到了宋朝时期，宋太宗专门设立组织进行翻译活动，但已经没有盛唐时期的兴旺盛象。南宋时期没有记载，元朝充其量也只有几十卷译本，明清时期佛教的翻译活动也不多。因此，从汉末至宋初近千年的译经事业，以隋唐为鼎盛，是中国翻译史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佛教翻译衰落之后，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清时期开始译介西方科技、政经、哲学、文学等著述，当时的士大夫与传教士联手把西方的宗教、文学、哲学等介绍到中国来。著名译者有梁启超、徐光启、李之藻、林纾、严复等。梁启超集政治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于一身，尽管所译作品较少，但他创办大同译书局，培养翻译人才，以政治影响翻译事业，

故他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徐光启所译大多是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六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独自翻译了很多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作。李之藻翻译了十卷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概论》，这是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的书籍，其中创用的许多逻辑术语沿用至今。林纾即林琴南（1852年—1924年），汉学功底深厚。他不谙外文，却与人合作（懂外文的人口述，他笔录）译了一百多部文学作品，硕果累累，其中包括《黑奴吁天录》、《巴黎卖花女遗事》、《雾都孤儿》、《哈姆雷特》等，许多文学译本都是经他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林纾的译文优美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为后来的文学翻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有益视角，对介绍西方文学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林纾不懂外文，译文因而难免有不尽忠于原文之处。而且，译文中还出现林纾本人依想象而创作的成分，其翻译更倾向于西人故事基础之上的创作，因此，译文因过于“归化”而为后人所诟病。严复（1853年—1921年）主要是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学著述，最著名的是《原富》、《天演论》和《法意》。在《天演论·译序言》（1896年）里，他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三原则，被后人奉为翻译的“金科玉律”，直至今日，仍不失其指导意义。鲁迅（1881年—1936年）在评论严复的翻译时，对我国古代的翻译原则进行概述，“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六朝真是‘达’而‘雅’了……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①此外，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1894年）详细论述了筹建翻译书院的重要性和具体做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事业对国人了解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起了很大作用，从而激发国人思变改革的思想。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五四运动是现代翻译的分界线，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是翻译活动的第三次高潮。此前，像严复和林纾等译者主要翻译西方的学术经典和文学作品。此后，西学东渐风气日盛，许多学子留洋欧美，译著颇丰，其中有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作品以及

^①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哲学、社会学著述的翻译，语言有俄语、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中国的翻译事业因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郑振铎、朱生豪、梁实秋、林语堂、傅雷、刘半农、傅东华、梅益等翻译家把翻译事业推向了辉煌的巅峰。仁人志士开始关注马列著作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作品，鲁迅和瞿秋白自俄语翻译了许多无产阶级作品，在激励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的创作与翻译并重，并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硬译”理论，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瞿秋白（1899年—1935年）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翻译情怀，提倡以翻译来丰富中文语言。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对翻译的本质、方法和批评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大文豪郭沫若（1892年—1978年）从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了独到的翻译观，主张“翻译工作者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茅盾（1896年—1981年）主张直译，提倡保留神韵。他1954年关于文学翻译的论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傅雷（1908年—1966年）运用美学原理，主张翻译“重神似不重形似”。这个时期，俄汉翻译占据很大分量，译作的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当时的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为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也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等领域，为翻译的系统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尤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随着大量反映新生活的翻译作品的问世，翻译实践活动愈发受到重视，翻译理论的建设也因而得以进一步发展。翻译逐渐摆脱隶属于语言学、社会学等的分支地位，为后来成为一门日益独立的学科作了铺垫。新中国的出版机构设专人负责外版书籍的翻译工作，杰出的翻译家有师哲、成仿吾、巴金、文洁若、罗新璋等。翻译理论的深入，从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1951年）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到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1964年）中提出“化境”，对早期的翻译原则、标准、方法作出了新的诠释，是对“信达雅”理论的突破。

目前有专门的出版机构进行翻译理论的引介和翻译实践活动，

如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和北京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在引进国外古典名著和现代杰作方面功不可没。此外，中国文学出版社主要从事汉译英的翻译工作，把大批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去。此外，还有一些大型出版公司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以及一些翻译理论刊物如《中国翻译》，都是中外文翻译实践的重要窗口，也是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高等学府尤其是外语类院校成立专门的翻译学院，培养翻译理论和实践人才，同时，外语师资也是翻译实践活动的骨干力量。此外，政府设有专门的翻译资格考试，从学术性、工具性的角度进行命题。这类测试实用性较强，不同的翻译考试侧重考查不同的方面，而且笔译和口译都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纵观以上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翻译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间翻译理论思想也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出现了“直译”和“意译”之分，并有“风格”之说，当代以来还引进了国外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对推动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优秀译作的大量问世，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不可否认，因中国翻译史上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论及翻译的文字一般简明扼要，切合实用，但缺乏系统的翻译理论著述。从学科建设的现状来看，中国翻译学科仍处于边缘地位，许多翻译观念需要统一思想，理论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二节 西方翻译发展史概述

西方翻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广义上讲，西方最早的翻译活动始于公元前3至2世纪期间，当时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圣经·旧约》，就是《七十子希腊文本》。严格意义上讲，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不过这两次翻译活动都是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

西方翻译史上曾经出现过五次比较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当时最著名的译作为《希腊文旧约圣经》(*Septuagint*)。据说，当时为了适应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要，72名学者在72天内把《圣经》从希伯来语译为希腊语。同时，由于希腊丰富的文化遗产，罗马文学家将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和大批希腊语作品译为拉丁语或用拉丁语改编希腊戏剧，把希腊文化移植到本土，打开了欧洲翻译的局面，使古希腊文学得以传播和承继。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可以说，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对于罗马以至后来整个西方世界承继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次是在公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翻译的这一发展与基督教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宗教意涵。为了传播基督教，就必须把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圣经》译为拉丁语，才能广为罗马人普遍接受。这一时期出现了多个《圣经》译本，其中最为著名、最具权威性的是哲罗姆(*Saint Jerome*，约347年—420年)于391年至404年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The Vulgate*)。在西方历史上，哲罗姆的地位不仅在于他是拉丁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对于基督教教义的哲学化作出了贡献，还在于他翻译《圣经》的工作对拉丁语文法、语言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论最优秀的翻译》有许多独到的建树。这一时期的许多译者都采用直译的处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圣经》是神圣的读本，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应该忠实传达原文的意思，因此直译法是最安全的办法。这些译文因此比较拗口难解。哲罗姆则认为“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从这一翻译理念出发，他的译文自然流畅、通俗易懂。这样《圣经》译本开始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

第三次是在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的中世纪时期，由于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文化交流，许多著述从阿拉伯语译成了拉丁语。这一时期，西方翻译家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阿拉伯语的作品译成拉丁语。此前的9、10世纪，叙利亚学者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语